



经典作家之 魏 巍

魏巍是位具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作家，在诗歌、报告文学、小说、散文、杂文和电影剧本等几乎所有的文学领域都有不俗的成绩。这之中，《谁是最可爱的人》无疑是最耀眼的，浓缩为一个时代的文学表情。“最可爱的人”从纸上世界回到社会生活，被人们在各种话语空间频繁使用，成为社会公众话语的河流中一朵激昂透亮的浪花。作家肖复兴称“可爱的人”是魏巍的一个贡献。评论家陈子善更是将此作品提升至一个很高的文学地位：“《谁是最可爱的人》堪比历史文献，写出了真正的红色经典。”

《谁是最可爱的人》堪称经典

擅长把叙事、写景、议论、抒情巧妙地融为一体；语言朴实优美，这是对魏巍创作的公认评价。但这样的评价是从创作力的层面进入的，很难让我们对魏巍有精到而深刻的认识。真诚，应该是魏巍创作最为显著和明亮的特点。真诚，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能力。作家只有深度地参与生活，才能为生活所触动、感动。在产生强烈的书写冲动后，能够艺术性叙述，才可能把态度上的真诚转化为写作上的真诚，最终让我们读到作品中的真诚和真诚的文学。在这方面，魏巍无疑是典范。正如他所说，“亲身经历、感性知识是最重要的条件，但是也要善于运用群众的经验来丰富自己。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尤其是在散文和报告文学中，他追求最大限度地呈现历史原生态，以大量的资料和亲历者的记忆将支离破碎的历史复合，做到了理性地尊重历史的真实，感性地进入和阅读历史情境，尔后激情飞扬地再整合再叙述。他以个性化的创作，竭力还原历史片段的全貌，捻拾生活的细节。在历史事实的从容叙述中迸发一种逻辑力量，张扬一股浩然正气，鲜明地吟唱历史赐予我们的精神力量。”

提及魏巍，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他的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作品流露出的真挚的爱国主义情怀曾经激励、鼓舞了几代人。作为一名作家，魏巍也是一位创作的多面手，除了文艺通讯外，作家在诗歌、散文、小说、文论等领域创作也颇丰。他的“革命三部曲”之一《东方》曾经获得1983年茅盾文学奖。耐人寻味的是，时隔二十几年，当我们重新阅读魏巍的作品时，发现其中值得回味与深思的东西少了许多。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前后阅读的巨大反差？笔者以为从文学经典的生成这一问题出发或许能得到索解。

关于“经典”，古今中外对其旨义的阐释，都无一例外地强调了其恒久的权威性、典范性。文学经典，一方面指称一个时代最优秀的作品，另一方面又集中体现了文学的本质特征。正是这种本质特征让文学经典获得了无限阐释的可能，也使其保持了经久不衰的魅力。那么，经典是如何确立的呢？除了丛书的出版、文学史的撰写、文学评奖之外，学校的人文教育也是文学经典确立的重要一环。入选人文教科书不仅是对一部作品经典性的认证，而且也意味着它必将对读者的阅读与精神世界产生深远影响，因此，需要在教育的普及中不断对其经典地位进行固化。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我的老师》先后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特别是《谁是最可爱的人》被收录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样本。此外，翻开任何一部当代文学史，谈及20世纪50—70年代中国革命战争题材作品时，魏巍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忽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魏巍的一些作品具备了经典性。

如果说作家的创作赋予了文学作品以独立的生命，那么，当这部作品进入社会层面之后，它的命运走向便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格局。事实上，绝大多数作品都会沦为“沉默的大多数”，只有极少数作品能够引起读者的阅读与舆论的关注，进而有可能迈入经典的行列。这些令人瞩目的极少数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其中所涉及的正经典的

经典作家

魏巍：源于生活激情的真诚叙事

□北 乔

《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3个事例，朴素而真实，由不得我们不感动。现在读来，魏巍在文末的这段话更具现实意义：“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看我：‘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

当我们持有所谓的某种立场，抑或进行所谓的零度阅读时，那么再好的作品也难以与我们的灵魂同频共振。这不是作品的力量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心灵有了沙漠化的倾向，我们对善产生了不该有的冷漠和不信任。

战场作为一个极端化的生活场，人面临最大困境，经受最大的挑战。自然也会集聚人类所有的情感与人性，或英勇或恐惧，或抗争或避让等等。英雄也是如此，他们有着人类最高的精神行为的同时，也一定是有点缺点的，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英雄。英雄的叙事，也不一定就要个体的英雄进行所谓的全方位叙述，在书写英雄行为的同时又偏执地将其拉到普通的人群里。同理，战争叙事也无需都无死角地呈现战争的全貌或战场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灵魂的每一个细微颤动。

近年来，我们在对红色经典尤其是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英雄叙事进行重新评价，并在文学史的层面进行重新定位，提出了“神性英雄”、“人的缺失”、“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等等观点和话题。但这样的行为，不能离开生活的情境、历史的语境和作家的真情实感，或者说，不能将文学与生活割裂，只谈文学的文学。文学史不应该是物理性的学术，应当是有生命体温的学术。这其中，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作家的创作态度是否真诚的问题。许多时候，我们没有亲历，就无法理解他们的行为，感知他们的内心。所以，当我们指责英雄叙事过于高、大、全，指责英雄叙事违背人之常情时，或许我们要做的不是学理上的推理和想象，而应努力回到生活的现场，体会非常态下人性力量的迸发和情感的喷涌。

就像魏巍等众多的作家，他们从战争年代走来，在战场上经历着炮火硝烟，看着身边的战友冲锋陷阵、流血牺牲，在生死考验中自然地挥洒人性、情感和精神。这种现场的体验，是无法抗拒的，也会成为创作的持久的动力。魏巍在谈起当年创作《谁是最可爱的人》时说，他是在1950年调入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的，半年后便接到去了解美军战俘政治思想情况的任务，告别妻儿，踏上朝鲜土地。在志愿军里，魏巍耳目睹了许多撼人心魄的事情，决心留下来。此次在部队采访历时3个月，在朝鲜前线的日子里，魏巍被这场伟大的反侵略战争所吸引，被英雄们可歌可泣的行为所感动。他产生了一种庄严的、神圣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感，认为自己应当立即把志愿军在朝鲜抗击侵略者的情况告诉给祖国各族人民。访朝归来已是1951年2月，他调到《解放军文艺》担任副主编，便抓紧一切时间赶写朝鲜见闻和感受。《谁是最可爱的人》，是魏巍在20多个最为生动的故事中，几经推敲、删减，最后选定3个最能表现本质的典型事例写成的。它们既有独立性又互有内在的联系，互为表

里、相辅相成地表现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这一主题。魏巍说：“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题目不是硬想出来的，而是在朝鲜战场上激情的情况下从心里跳出来的。我能写出《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基本的原因，是我们的战士的英魂、英雄事迹是这样伟大，这样感人，而这一切把我完全感动了。”

结合文本和创作谈，以及大量的有关战争、战场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看到，魏巍没有做渲染和故弄玄虚的操作，没有对生活指手画脚和自以为是的涂抹，只是将生活进行断面的截取和细节的分拣。他在深度参与生活的同时，努力地对生活进行审美性的感知和解读。应当说他将生活者与创作者智性而艺术地融合，以普通人的方式坚守于生活，以作家的个性关注和解析生活。那么他在熟悉掌握大量新鲜生动生活的同时，又在进行心灵的内化和审美的读解。他是在如实地讲述，最大限度地还原生活的种种。他的讲述和还原让他由写作者转变为引领者，带着我们走进他想让我们走进的生活。如此的还原是艺术的，有一种穿越时空的真实和亲切。

对此，评论家陈子善有很中肯的评价：《谁是最可爱的人》影响很大，按照现在的说法，作品真实反映了抗美援朝时志愿军的战斗生活，在当代文学史上，其作用相当于历史文献。这部报告文学在我们的研究领域是作为左翼报告文学进行研究的，属于红色经典。而且，我认为的红色经典，只有《谁是最可爱的人》这样的作品才能算是，它当时产生过正面的影响。现在回过头看，当然也存在时代的局限，因为写抗美援朝时有一定的表现手法，我们今天来看，它只反映了部分的真实，但所有的文学作品都不可能全部真实，总会有局限，它当时能产生那么大影响，我觉得应该给它一个恰当的历史地位。

……《谁是最可爱的人》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而且很感人，有非常强的文学性，就是在今天看还是很感人，这个题目就非常有感情。当时写抗美援朝出了相当多一批作品，例如巴金的《团圆》，但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最突出的，最有代表性的，它读起来很亲切，教条的东西比较少。作品中的某些词语和表述的确有着那个时代特殊的印记。但如今我们阅读《谁是最可爱的人》，依然是那样的激情澎湃，那样的激荡着我们的心魂，那些闪光的坚硬的精神力量依然在滋养我们。

对《东方》的重新考量

或许是因为《谁是最可爱的人》在文坛内外的影响过于强盛，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东方》的光芒，尽管这部作品曾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和“首届人民文学奖”等诸多大奖。的确，《东方》与当下的众多战争文学有着很大的区别，甚至有巨大的陌生感。我们操纵着各种样式的理论话语对其进行肢解和再阐释，以基于资料式的想象表现自身的好恶，极端地用意识形态、政治话语或所谓的战争再发现等视角去再评价。我们常常以非文学的方式去面对文学，但偏偏又无法立于生活的大地。如此一来，这样的评价只能在文学和生活之外的某个空间晃荡。无论是研究性的阅读和欣赏性的阅读，还是要回到文本本身，回到“人”的生存状态。那种以理论套现作品，擎着某种固化的观念进入作品，带着无体

魏巍作品经典性的生成

□孙 谦

值出发，强调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是某种“陌生性”。这些说法虽不尽相同，却揭示了经典的某些本质性特征。但是，当我们以这些标准为准绳去衡量文学作品时，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作品符合经典的某些标准，却被剔除在外？而有些作品似乎差强人意，却被列入了经典？这难道仅仅是标准的差异？在论者看来，这里面其实涉及了经典与经典的生成问题。当我们谈及经典的时候，更多的是在讲经典的标准问题，这个标准其实是关于经典的本质特征，或者可以将之称为“经典性”。它是一个静态的、共识性的东西。当我们以这样一个常识性的标准去衡量身处变动不居的历史中的文学作品时，自然会对其中的变异与错位产生种种匪夷所思的感觉。相对于经典性这一静态的参照而言，经典的生成则是一个动态的、充满着话语博弈的结果。正如杜卫·弗克马在《所有的经典都是平等的，但有一些比我们更平等》中指出的，“所有的经典都由一组知名的文本构成——一些在一个机构或者一群有影响的个人支持下而选出的文本。这些文本的选择是建立在由特定的世界观、哲学观和社会政治实践而产生的未必言明的评价标准的基础上的。”经典的生成不仅与经典本身的标准与规范有关，而且也受特定历史时期文化系统的制约，是不同话语之间的相互纠葛、渗透与调和的过程。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魏巍作为部队的文化工作者赶赴朝鲜进行采访。1951年回国后，魏巍根据在朝鲜的采访开始创作《谁是最可爱的人》。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3500字的通讯特写。毛泽东做出了“印发全军”的批示。1953年周恩来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讲话时，曾指出“它感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的战士”。此后，“谁是最可爱的人”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名词，这部作品和魏巍其他的朝鲜通讯开始大量出

版发行。先是解放军文艺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将之结集出版，盲文出版社又将之作为该社成立后第一本盲文书出版，随后《谁是最可爱的人》入选了语文教材。《魏巍纪事》中，作者记述了这本书的发行情况：“‘解放军文艺丛书’《谁是最可爱的人》初版于1951年10月，1954年重印时增加了《这里是今天的东方》一文，成为第二版。1958年9月重印时又增加了《勇士镇守在东方》和《写在凯歌声里》两文，成为第三版。1963年7月版又增加了《依依惜别的深情》和《我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两文，成为第四版，此后的版本就再未更动。这本书仅解放军文艺社印数累计就多达462000册。”透过这段回忆性材料，我们一方面看到这部作品所经历的“特殊待遇”，另一方面也看到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指示、肯定、推广阅读，对这部作品的经典化生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它们作为作品的流传与阐释提供了充分的舆论空间。特里·伊格尔顿在《美学意识形态》中指出，“从道德到文化的转变也就是从头脑的统治到心灵的统治的转变，从抽象的决定到肉体倾向的转变。诚如我们所知，‘完整’的人类主体必须把必然性转化成自由，把道德责任转化成本能的习惯，这样主体就会如审美艺术品一样起作用。”魏巍的战地通讯，以史实、抒情、政论有机融合的方式改变了关于革命理性法则的枯燥说教，将革命意识形态的要求转化为个体内在的审美需要与情感认同。

其次，《谁是最可爱的人》经典化的生成还与这个时期对文学认知与教育功能的突出与强化有关。情感、审美、认知、规训无疑都是文学的功能，20世纪中国文学因其能够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本质与历史的必然规律而具有的认知与规训功能不断被强化，导致文学与社会政治之间的紧紧缠绕。从上个世纪初梁启超提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改变世道人心”，小说被放置神坛，到20世纪20年代末左翼革命文学的创作与

验式的想象阅读时，都将难以进行有效的研究与阅读。因而，在某种程度上，重新阅读《东方》（当然，不仅仅是《东方》），其实是考量我们的文学思想、阅读态度以及体味文本的能力。

在战争文学中，尤其是中国现当代的战争文学，《东方》的价值是独特而长久的。辽阔的视野、史诗性的叙事、对人物的传神刻画、张扬人处于困境中的正能量精神以及生活本真的现场感，在文学史和现实生活的双重向度上都具有很高的品质。魏巍将后方生活与前方战场的叙事进行了无缝融合，形成一个完整生命体式的叙事，让日常生活与极致化状态产生双向性的有意味的流动和观照。对于战场的书写，他不只是在写战斗，而是将战场真正还原为人生存的一个场域。是的，军人已经不只是战士，还是战场上的生活者，战斗只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当然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但他们也有着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只是这样的日常生活是在战场这样一个特定的生活现场。在他的笔下，军人的性情是那样的真实而可爱。他在塑造人物的性格，但并没有前置某种观念，而是让人物在不同的情境表现出不同的性情。这让我看到了战场上军人的真实，看到了军人作为战士和作为人的复合体。魏巍在《东方》中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异常丰富的人物形象谱系，这一群人，如果粗略统计，其数量之全、类型之丰，可能超过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所有革命战争题材的小说：郭祥、邓军、周仆、杨雪、杨大妈、洪川……有我军师团一级的将领，连排一级的指挥员，普通的共产党员和战士；有“革命的母亲”，有普通的革命农民；有朝鲜的将领、战士及人民军的母亲及天真活泼的孩童；有无产阶级的蜕变分子，地主阶级的典型，也有在西方“人文民主”精神熏陶下的士兵，这里的每一个人的背后，都连着一个丰富复杂的世界和成长历程，都有其必然的政治背景和个性化的人格，都有一连串具体、生动、形象的故事。这些人物，或许有些让我们觉得不可信，或许感觉有面具之嫌，但我们又不能否认，在那个年代，这些人物的确鲜活过。

细读下来，《东方》的语言也相当有特色，真正应合了战场上军人的气质和特性。刘大顺被敌军包围，眼看要被活捉，心想，“我是共产党的兵，决不能当俘虏。今天就是死了，也要找几个垫背的！”这样的心理活动，既有英雄的气概，又有人物的平常，当然也有政治性的浸染。类似这样的人物语言，在《东方》中比比皆是。总体而言，这样的语言是由三部分组成的，来自于家乡的原生态语言、战场上军事化的话语和带有时代政治色彩的言辞。这三部分语言，在不同的情境之下，在不同性格的人身上，以及语言指向对象上，随机而变，表现出极强的语言功能性。因为时代的变化，我们对《东方》中的一些语言出现间离性的不解，甚至认为是魏巍脱离生活的再造，这真是一种误读。人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情境，不同的对象面前，语言总是有着特定的表情，有着特定的表述形式和内容。时代性，不应该成为贬义词，浓重的时代印记和政治色彩，正是通向人物内心的最好钥匙，而不是成为我们或嘲笑或误解的理由。

《东方》最具价值之处在于魏巍对于生活的真诚以及将真诚落到叙事的能力。与一些军事文学的作家不同的是，魏巍是战场的亲历者，又能以采访者的身份去体察战场中的军人，回访从战场归来的军人，并用心查阅大量的战争资料。他将感性和理性统一在文学叙事这一行为之中，艺术地再现战争、战场、战斗和那些勇敢的军人。

一些体裁比其他文体更具经典性。就《谁是最可爱的人》等作品而言，它们的经典化生成与其采用的通讯报告体裁也是分不开的。作品发表后，虽然影响深远，但是有些人也对它的文学性表示了质疑，丁玲反驳说，“现在的确有不少的人，以为只有长篇才是伟大作品，才值得辛辛苦苦地去写它，或去谈它。这完全是错误的。作品的价值不是以长短来计算的。今天我们文学的价值，是看它是否反映了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我们国家的时代面影，是否完美地、出色地表现了我们国家中新生的人，最可爱的人为祖国所做的伟大事业。因此我以为魏巍这两篇短文不只是通讯，而且是文学，是好的文学作品。”丁玲的回答一方面阐明了文学价值的标准，另一方面也充分肯定了通讯这一体裁在反映现实方面所具有的优势。与小说、诗歌等体裁相比，散文这一体裁的边界在20世纪50年代不甚清晰。原因在于它的创作路向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从个体精神态度的显示、自我心灵的书写逐渐向反映时代、汇报时政的代言式写作转化。其中，文艺通讯因反映生活真实、迅速且又有一定的艺术观照而备受作家青睐。以《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为代表的文艺通讯正是凭借这种体裁优势，以最快的速度呈现了在那场神圣的保家卫国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奋勇杀敌的英雄主义精神，并在抒情与议论中将之转化为一代人的精神资源，进而对读者的世界观与行为模式产生深远影响。

文学经典虽没有一个通约的标准，但是文学经典化的脚步却从未停止。文学作品在诞生的瞬间就已身处经典化的途中，不断地经受着历史的淘洗与筛选。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是文学经典的试金石。与此同时，文学经典的生成也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团体作用的结果，它是文化系统中诸要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对文学经典化的过程，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它的阶段性、历史性和相对性与绝对性的辩证统一。今天，《谁是最可爱的人》我们依然无法否认对一代人精神成长的巨大意义。经典秩序的变动证明了经典的流动性与开放性，也为文学生态的良性循环提供了必要的制衡。